

# 鲁迅信任的画师陶元庆

■蔡登山

不久前，香港作家鲍耀明先生寄来周作人送给他的绝版书的书影。在他收藏的这三十四册书中，绝大部分是知堂老人的著作，其中有1937年3月宇宙社出版的《瓜豆集》，知堂老人在上面题有“洙邻先生尊海 受业周作人呈”。该书原是送给老师寿洙邻先生（他是鲁迅老师寿镜吾的次子）的，现何以在鲍先生手中呢？原来知堂有说明：“寿先生以九十岁去世，其家乃以见还，今以转赠耀明先生。”该书除了平添一段来历外，卷头又有寿先生的批语，更见史料价值。

而在众多朴实无华的周作人书衣中，赫然惊见1933年《沉钟》半月刊（《沉钟》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10日，至第十期停刊。1926年8月10日，改为《沉钟》半月刊，出至第十二期又停刊。1933年10月15日复刊，为第十三期。出至第三十四期1934年2月28日停刊）第十八期的封面，那瑰丽奇特的风格，原是出自陶元庆的手笔。

陶元庆（1892—1929），字璇卿，浙江绍兴人。自幼喜欢画国画，擅长仕女、花卉。1913年，他入读绍兴省立第五师范学校，毕业后留校担任附小教员。1923年，他考入上海时报馆，成为该报馆的一名美术编辑，专门负责《小时报》的刊头设计。同年，他进入吴梦非办的上海师范专科学校，从陈抱一研习水彩、油画，吸收西洋技法。1924年7月，他初到北京，住在绍兴会馆，因作家许钦文之介，而结识鲁迅。当时鲁迅在北京各高校授课，其中



陶元庆所画《故乡》封面



陶元庆为鲁迅所画肖像

作为文艺理论讲义而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《苦闷的象征》即将出版，就请陶元庆作封面画，陶欣然接受。图成，封面画由一个半裸体的女子，披着长长的黑发，用鲜红的嘴唇舔着钹钹的尖头变化而成。鲁迅盛赞其“使《苦闷的象征》披了凄艳的外衣”。许钦文更认为它“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”，而五四新文学书籍以图案为封面的这是第一本。该书初版时因新潮社经费拮据，封面用单色印刷。鲁迅觉得过意不去，于是待初版售完后，以他的版税来补足印书经费，并将封面由单色还原为三色，视觉效果也更加强烈了。

陶元庆其后为鲁迅的著作《彷徨》《坟》《朝花夕拾》《工人绥

惠列夫》《出了象牙之塔》《唐宋传奇集》等书绘制封面画，其中最著名者首推《彷徨》一书之封面。画的是三个人同坐在一把椅子上，看着逐渐西移的落日，给人一种日薄西天的彷徨之感。整幅画采用了鲁迅最喜爱的版画形式，构图简洁、变形、夸张中传达了深邃的内蕴。鲁迅称赞说：“《彷徨》的画面实在非常有力，看了使人感动。”《彷徨》的封面设计成为当时书衣画的代表作。可是当时有人却看不懂其寓意，以为居然连太阳都没有画圆，陶元庆只好愤愤地说：“我真佩服，竟还有人以为我是连两脚规也不会用的！”

许钦文是陶元庆终生不渝的好友，许钦文的小说、散文集的封

面，几乎都出自陶元庆之手。1926年许钦文出版第一本小说集《故乡》，以陶元庆的“大红袍”作封面。许钦文后来回忆说：“当时住在北京的绍兴会馆里，日间到天桥的小戏馆去玩了一回，是故意引起一些儿童时代的回忆来的。晚上困到半夜后，他（陶元庆）忽然起来，一直到第二天的傍晚，一口气就画了这一幅。其中乌纱帽和大红袍的印象以外，还含着‘吊死鬼’的美感——绍兴在演大戏的时候，台上总要出现斜下着眉毛，伸长着舌头的吊死鬼，这在我 and 元庆都觉得是很美的。”鲁迅见到此图称赞道：“有力量，对照强烈，自然调和，鲜明。握剑的姿态很醒目。”后来鲁迅又对许钦文说：“我打算把你写的小说集起来，编成一本书，定名《故乡》，就把‘大红袍’用作《故乡》的封面。这样，也就把‘大红袍’做成印刷品，保存起来。”《故乡》出版后，人们立即为其精美的封面画所倾倒。之后陶元庆又为许钦文的《毛线袜》《幻象的残象》《回家》《一坛酒》《蝴蝶》《鼻涕阿二》《赵先生的烦恼》《仿佛如此》《若有其事》《无妻之累》等书作封面。

鲁迅曾多次称赞陶元庆的作品，并因为一再请其作画，说自己是“得陇望蜀”。除此而外，鲁迅还转请陶元庆为文学刊物《沉钟》和

《未名》等书刊作封面，代王品青转请为其女友“淦女士”（冯沅君）的小说集《卷施》（后由司徒乔创作），以及董秋芳翻译的俄国小说《争自由的波浪》、李霁野翻译的安特莱夫戏剧《黑假面人》等作封面。

1929年8月6日，陶元庆因患伤寒，经医治无效，在杭州广济医院去世，终年三十七岁。许钦文将此噩耗告知在上海的鲁迅，鲁迅在8月10日的日记中悲痛地写道：“夜得钦文信，报告陶元庆君于六日午后八时逝。”随后，许钦文去沪，鲁迅“付以钱三百”，并叮嘱许钦文“为陶元庆君买冢地”，妥善处理后事，还打算出版陶元庆的遗作。1931年的8月14日晚上，鲁迅偶翻陶元庆生前送给他的画集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在画集的扉页上写下：“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。倏忽已逾三载，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。草露易晞，留此为念。呜呼！”其实让鲁迅可以存念的，还有陶元庆为他画的肖像。鲁迅一直想请陶元庆给他画肖像，陶元庆自是愿意，不过因为两人的时间一直凑不好，始终没能找出时间来做素描。后来陶元庆返乡在台州任教，鲁迅才把自己的照片寄去，请陶元庆在假期对照片画一张肖像。1926年5月，陶元庆把画成的头像寄给鲁迅，这就是鲁迅生前最喜爱的一张自己的肖像了，后来这幅画就一直摆放在北京阜成门外西三条胡同的“鲁迅故居”客厅正中。哪天您在景仰鲁迅之余，也别忘了陶元庆！

亚洲的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、印度大诗人泰戈尔，在中国有广泛的影响，鲁迅也很重视他，多次谈到他，对他深表敬意。对我来说，印度是一个太陌生、带点神秘的国度，而泰戈尔则是带点仙气的“男神”，根本没有想过会跟我有什么联系。不意，我却有了拜访泰戈尔故乡的荣幸。近期，我随鲁迅文化基金会“大师对话：鲁迅与泰戈尔”代表团访问了印度，来到泰戈尔的故乡加尔各答市。这是印度的第三大都会，总人口达到一千四百万，现在经济虽然不是发达，可是这里却出过三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呢！除了泰戈尔，还有获得1930年物理学奖的拉曼，另一位就是著名的特蕾莎修女。这样一座神奇的城市，是我早就期望一睹真容的。

泰戈尔故居坐落在加尔各答市中心的一条繁杂的马路旁，穿过一条不太宽的通道进入院内，发现它是一个很宁静优雅的院落。一块绿油油的草地，周边是美丽的花丛旁，坐落着两栋玫瑰红色的两层印度城堡式建筑，风格独特，装饰精致，跟外面街道上的杂乱建筑完全不同，让人一下忘记了外面街道上的嘈杂喧嚣。建筑上标明的时间是1782年，是泰戈尔的爷爷建造的。泰戈尔就出生在这里，而且实际上他都以这里为家，除了去一百多公里外他自己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工作以外，就主要生活在这里。

这里现在已经改为泰戈尔纪念馆。大家都很自觉地脱了鞋，恭恭敬敬进楼参观。这个建筑是水泥和木地板相结合，门窗高大，通透敞亮。大楼呈回字形，里面曲径通幽，大大小小房间有数十间。这是一个婆罗门大家族聚居之地。泰戈尔有兄弟姐妹十四人，他是家里的老幺。这里除了

# 泰戈尔故乡行

■王锡荣



“大师对话：鲁迅与泰戈尔”中国代表团在印度泰戈尔故居前合影

陈设泰戈尔家族的历史面貌，还集中展示了泰戈尔生平。我看到了泰戈尔访问中国的历史镜头，也看到了与泰戈尔来往密切的徐志摩等中国人的照片。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泰戈尔的卧室，那是一个几乎敞开的空间，中间一张床，其他东西很少，房间两侧居然有四个门，都可通向走廊。1941年8月6日，泰戈尔就在这张床上去世，享年八十岁。在他去世前两个星期，政府用专列把泰戈尔从国际大学拉回了家。瞻仰了泰戈尔故居，让我们知道，这个世界闻名的大诗人，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和写作的。我想象他1910年在这里写下长诗《吉檀迦利》，那幽美的环境描写，跟这个美丽的院落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
学院”，专门培养与中国交流的人员，首任院长是中国人谭云山，现在的院长是阿维杰特·班纳吉教授。“大师对话：鲁迅与泰戈尔”的印度代表团来访中国时，班纳吉教授也是代表团成员，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。

我们一下车，就看到班纳吉在等候我们。我们一行二十来人跟随班纳吉步行大约二百米，就看到侧面院子里一座方方正正的两层楼建筑，门楣上方的墙上镶嵌着一块石板，上面是雍容而刚劲的“中国学院”四个字。

班纳吉教授带领我们进入学院，很多学生对我们展露着友好的笑容，表示欢迎。我们跟学院的领导和教师进行了座谈

交流。周令飞秘书长带去了鲁迅文化基金会的资料和鲁迅的作品，留给学院作为纪念，并谈了与印方开展持久深入交流的设计。班纳吉院长介绍了学院的情况，并表达了迫切希望与我方展开深度交流的愿望。座谈结束后，我们参观了学院的各个部分，其中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的中文藏书，尤其是大批珍贵的中文古籍。我们匆匆浏览了一下，有很多还是清代善本，管理非常规范，而且很明显这些书是经常有人在使用的。因为这里一直有中国人任教，印方人员的中文古籍研究看来也是颇有深度的。随着中印之间文化经济往来增多，中文需求在印度不断提升，学生报名踊跃，每年都是经过严格筛选，才从中选出二三十名学生入学。班纳吉说，整个大学现在在校学生八千多人，已经构成一个成熟社区。

从中国学院出来，往前走几十米，就是泰戈尔博物馆。进了这个馆才知道，加尔各答的泰戈尔故居纪念馆里面，其实多半是复制品和照片，而这里，才是货真价实的文物：包括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奖状、手稿、藏书，以及很多生活用品、文具、纪念品等等。看了这些文物，泰戈尔在我们心中的形象，越来越丰富饱满起来，让我们感受到这位印度国民诗人的伟大胸怀，也感受到他跟中国人的亲近感。

泰戈尔生前到过中国三次，而鲁迅从来没有机会去到印度，当然并不是他不想，他对泰戈尔是敬重的，也是理解的。今天，我们通过“大师对话：鲁迅与泰戈尔”项目，有机会到泰戈尔的故乡寻访泰戈尔的足迹，可说是替鲁迅先生还愿来了，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，加强中印文化交流，沟通两国人民的心。